

# 宋代太学生舆论对国家战和决策的相关性分析

张传杰、付舒\*

**摘要** 本文根据史书史料和历史学研究成果，在政治学理论框架下，以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对宋代太学生舆论与国家战和决策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宋代中国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冲突与战争持续不断，“军事作战”还是“谈判议和”的战和决策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太学生群体既了解国家大事，又积极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讨论，是宋代政治社会中介于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知晓型民众。我们发现，太学生的对外政策舆论态度是稳定的、一致的，始终坚定地希望国家对敌作战，主张罢免主和派官员并启用主战派官员。历史案例表明，太学生的舆论表达对皇帝战和决策之间存在相关性，甚至会成功罢免主和派官员，对国家的对外政策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作用。在案例分析中，我们运用“最不相似比较法”和“最相似比较法”，发现太学生舆论表达的规模越大，越容易限制皇帝的决策。在宋代皇权专制制度下，知晓型公众舆论利用瞬时的规模压力迫使政策制定者被动地做出政策调整，从而影响国家对外政策。

**关键词** 公众舆论 对外政策 太学生上书 宋代战和决策

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之间的相关性是政治学学者十分关心的研究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通过统计实证、案例分析和访谈等方法，对对外政策公众舆论的特点以及舆论与对外政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较丰富的结论。然而，这些结论大多是在西方民主体制的框架下得出的，而且以美国政治案例为主。也有一些政治学学者意识到，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关系的讨论应该扩展到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政治制度。<sup>①</sup>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公众舆论与国家对外政策的相关性，既是对对外政策公众舆论理论的拓展，也是从中国古代政治

---

\* 张传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付舒，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

<sup>①</sup> Ole R.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204.

案例中汲取有益政治理论的有益探索。

中国古代是皇权专制体制，皇帝（或特定时期的皇帝代理人）是对外政策的唯一制定者。传统观念认为在专制体制下公众舆论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sup>①</sup>因为皇帝并非民选，不必对任何人负责，所以公众舆论不会对皇帝决策构成影响。但是，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一书中探讨了中国古代公众舆论的表达，体现了中国古代清议与朝廷权威之间的斗争。<sup>②</sup>该书启示我们中国古代公众舆论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也许存在某些规律。

宋代太学生作为连接普通百姓与政治精英之间的社会群体，对中国古代舆论与政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切入点。在宋代，与培养官宦子弟的国子监不同，在太学读书的太学生大多来自普通百姓家庭，是一个可以听见普通民众呼声的群体。<sup>③</sup>此外，大部分太学生以入朝做官为目标，他们比普通民众更关心、更了解国家大事。借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宋代的太学生是当时社会中的知晓型民众。<sup>④</sup>因此，太学生通过上书进谏所表达的知晓型公众舆论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宋代太学生干预政治的舆论表达蓬勃兴盛。靖康之难，就有陈东率领诸多太学生伏阙上书，请诛六贼；宋王朝南渡之后，每逢国家面临战和取舍、宰臣进退等大事时，往往也能看到太学生的舆论表达。而且宋代太学生舆论表达在史料中记载相对详实，对几次重要伏阙上书的记载，可以找到多部史料进行比较和佐证。两宋时期不乏太学生对国家战和决策表达强烈看法的案例。因此，本文聚焦于中国古代参与性民众舆论与对外政策之间的相关性。

我们以正史史料为研究素材，采用实证的案例分析法，希望回答以下两个核心问题：（一）宋代太学生舆论对国家战和决策是否构成影响？（二）如果有影响，什么情况下太学生舆论对国家战和决策产生影响？其实第二个问题可以间接回答，在宋朝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下，为什么太学生舆论能够左右国家的对外政

---

①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5; Gordon Tullock, *Autocracy*,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7.

② 林语堂【著】，刘小磊【译】：《中国新闻舆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该书原由林语堂先生用英文写作，题为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于1936年在上海由英商凯利和威尔士有限公司出版，同年在美国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

③ 国子监招收的生员必须是七品以上的官员子弟，而宋仁宗期间太学的设立，使太学脱离国子监而独立。独立后的太学，吸收更多的学生，而且与国子监的贵族子弟分开，使得很多太学生来自普通老百姓家庭。关于此观点的论述，参见张晓宇：《北宋太学制度与太学生救国运动内在联系初探》，《学术月刊》，2003年10月，第60-66页；边勃：《两宋太学制与太学生的参政活动》，《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第76-78页。

④ Gabriel A. Almo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raeger, 1950.

策？

## 一、文献回顾

### （一）不同政治制度下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

公众舆论 (public opinion)，也称民意，是相当数量的公民对某一公共或政治问题表达出的看法。就公众舆论主体而言，学者们有明确的划分，包括普通民众 (general public)、参与型公众 (attentive public)、知晓型公众 (informed public) 和精英 (elite)。一般认为，普通民众对对外事务既不感兴趣也不了解，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有限；参与型公众对国际事务有一定了解并且感兴趣，但缺乏影响政策的手段；知晓型公众不仅对公共事务十分关心，而且能够参与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精英是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政治影响力都比较高的群体，他们不仅对对外政策深入了解，而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sup>①</sup>本文讨论的太学生，既对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十分关注，而且通过上书等方式参与政策的讨论，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知晓型公众。

对外政策指的是一国政府对其他国家采取的行动。对外政策包括很多方面，在对外政策舆论中，讨论较多的对外政策包括海外军事部署、海外军事干预、对外援助、国防开支等等。由于赵宋王朝始终面临北方民族国家的安全威胁，所以本文讨论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国家的战和决策，即主战抗敌或避战求和。

政治制度是政治学学者始终探讨的问题。西方的政治学学者对政治制度的探讨最早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而且所探讨的政治制度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他根据一个国家享有政权人数的多寡和受益方仅是统治者还是广大人民，把政治体制分为三大类六小类。<sup>②</sup>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标准在今天依然被沿用。当然，当代的政治学者们对政治制度的讨论更为详尽，而且根据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对政治制度的分类更为准确。虽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有其独特性，但为了研究的方便，学者们试图根据中立的价值判断给出了细致的制度分类。例如，美国政治学著名学者迈克尔·罗斯金 (Michael G. Roskin) 等人尝试对当今存在的政体归纳出四个类别，包括民主国

---

<sup>①</sup> Gabriel A. Almo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raeger, 1950, p.138.

<sup>②</sup> Aristotle,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reface.

家、转型国家、威权国家和极权国家。<sup>①</sup>

我们研究的是公众舆论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在本文将主要把这一关系放到两种政治制度中考察，即民主制度（democracy）和专制制度（autocracy）。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西方民主制度仅在近 200 年才出现，在美国以 1832 年 50% 以上成年男子获得投票权为标志。而在民主制度出现之前，专制制度是绝大多数国家政治制度的常态。

在西方民主体制下，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是政治学者讨论较多的话题。虽然西方学者尚未完全厘清舆论与政策的互动机制，但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中，公众舆论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已愈见清晰。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先驱性地发起了公众舆论如何影响对外政策的讨论，他当时认为该理论亟需得到发展。<sup>②</sup>对舆论与政策关系的探索是从一个比喻开始的，小 V.O.基（V.O. Key, Jr）提出了“拦水坝体系（system of dikes）”理论。公众舆论是一系列左右公共政策方向的拦水坝，舆论的影响并不会直接形成政策，而会限制政策制定的方向和界限。<sup>③</sup>“拦水坝体系”理论的提出，为舆论与政策关系的研究树立了一个新的起点。伴随着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公众舆论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机制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进展。理查德·索贝尔（Richard Sobel）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美国对外军事介入的 4 个案例进行了分析，印证并深化了“拦水坝体系”理论，认为公众舆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仍无法直接制定政策。

<sup>④</sup>伴随舆论调查的发展，不少学者对舆论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统计分析，为舆论影响政策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解释。阿兰·门罗（Alan Monroe）开创性地讨论了公众舆论与公共政策的拟合性（congruence）和一致性（consistence），并发现往往在舆论的变化之后，政策会随之改变，尤其是对于那些突出活跃（salient）的议题。

<sup>⑤</sup>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和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Shapiro）为公众舆论影响政策提供了因果关系的解释，他们运用统计学方法从 1935 年到 1979 年美国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的数据中发现，政策与舆论之间有明显存在明显的一致性，

---

① Michael G. Roskin, et al.,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Longman, 2012, pp.96-116.

② James N. Rosenau,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③ V. O. Key, Jr,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1.

④ Richard Sobel,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Vietnam: Constraining the Colossu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⑤ Alan Monroe, "Consistency between Public Preferences and National Policy Decision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7, No. 1, 1979, pp.3-19; and Alan Monroe,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policy, 1980-1993,"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2, No.1, 1998, pp.6-28.

并且舆论影响政策的效应大于政策对舆论的影响。<sup>①</sup>

关于民主体制以外的体制内公众舆论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早期的学者假定专制体制下公众舆论的影响微乎其微。所有专制统治者不用对其他任何人负责，独掌权力的统治者往往独断专行，因此很少会在乎民众的感受。<sup>②</sup>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在《专制体制》一书中认为在专制体制下，政府很少被大众起义推翻。大部分情况下，政府内部的其他成员和外国人的入侵才是专制者真正的威胁。他分析了罗马共和国政权颠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指出那些人民推翻不受欢迎的暴政的历史案例，全都包含政府内部不同派别的争斗，只不过其中一方拥有更广泛的民众支持。<sup>③</sup>以此逻辑，公众舆论在高度集中的专制皇权面前是势单力薄的。但是，专制体制下的舆论与政策的关系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所以很多相关的陈述并不可靠。在某些专制制度下，并不缺乏公众舆论的表达，也有很多民意影响政策的案例。而且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公众舆论与统治者经常会发生一定的政策偏好上的偏差。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拔河游戏中，总会有来自公众舆论的批评，不管是哪种政体。<sup>④</sup>

在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舆论与政策关系之前，我们不能简单地假定民众对国家政策没有态度。在中国古代，自有“天听自我民意”、“仁政总是顺乎民意”的信条。而且开明的君主十分强调“言路畅通”，直到明初，朝廷仍允许并鼓励没有入仕的普通士人向皇帝上书言事，创造民意表达的渠道。另外，如果普通百姓碰到严重的不公，如遭遇横征暴敛，可以通过“罢市”、“击登闻鼓”或“拦轿喊冤”等方法表达民意。尽管这些声音经常被当权官员压制，但在一些特殊时期或特殊情况下，比如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总会涌现出各种运动，组织有序并且主张明确，有效地对朝政施加影响。<sup>⑤</sup>无独有偶，在外族势力征服中原之前的三个时期，公众舆论都得到了有组织的表达。例如，东汉时期的“清议”和学生运动；南宋为蒙元的铁蹄所灭亡之前，也出现了学生运动；最后在清军入关的前夕，明朝士大夫联合起来反对阉党，力图重新整备军力，望拯救国家于废弛和混乱之中。

对外政策舆论的研究对民主制度以外的政治制度是有所忽略的，其原因不难

---

① Benjamin I. Page and Robert Y. Shapiro, "Effects of Public Opinion on Poli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7, No.1, 1983, pp.157-190.

②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5, p.4.

③ Gordon Tullock, *Autocracy*,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7.

④ 林语堂【著】，刘小磊【译】：《中国新闻舆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3页。

⑤ 林语堂【著】，刘小磊【译】：《中国新闻舆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5页。

理解。在民主制度下，政策制定者因为选举的现实需要会重视民意，因此利用科学统计方法的民意调查在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形成了大规模的产业，也为研究西方公众舆论的特点、变化和对政策的影响提供了最直接的数据。但是有关其他政治制度下的相关探讨则寥寥无几，其原因并不是其他政治制度（比如专制制度）中的舆论与政策关系不重要，而是受制于材料的限制和数据的缺失。因此，从史书、史料中挖掘有益的信息，有可能使公众舆论理论加以完善。

## （二）关于宋代太学生舆论的历史学研究

早在民国年间，就有学者对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进行较系统的整理。1926年，吴其昌有感于“三·一八”惨案，愤然写下《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并发表在《清华学报》。该文整理并归纳了大量史料中的太学生干政事件。<sup>①</sup>1936年，黄现璠所著的《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堪称该领域史料最为详实、全面的著作。黄现璠比吴其昌更进一步，不仅把宋代太学生运动分为对外和对内两大篇章进行讨论，还对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的起因进行了分析，总结为“强敌之压迫、朝臣之怯懦、小人之恣虐、舆论之援助”。<sup>②</sup>1947年，翦伯赞在《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描述了陈东的伏阙上书案例，以小见大，并且明确呼吁中国知识青年应该向陈东的爱国反抗精神学习。<sup>③</sup>以上三篇关于宋代太学生舆论表达的研究，其写作背景大多紧密结合时事，在作者著书时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宋代太学生所表现的正义、爱国与责任感给予强烈的肯定，以此激励当时的青年。但正因如此，这些著作不免带有主观目的，在事实的准确性方面，难免有失偏颇。

近三十年来，历史学者们在提高事件的客观程度方面，做了相关的研究与突破，不再对太学生舆论持全面的肯定态度。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宋代太学生舆论并非始终保持纯洁的爱国热情，在南宋末期出现被朝廷收买、威逼利用等情况，太学生的整体道德素质下滑，他们甚至追逐名利、卷入党争。<sup>④</sup>还有其他学者指出太学生的舆论表达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未将矛头指向皇权，只攻击权臣和宰相。

⑤

① 吴其昌：《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1929年，第999-1046页。

② 黄现璠：《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

③ 翦伯赞：《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大学》，第6卷第2期，1947年。

④ 郭晨虹：《南宋时期太学生伏阙上书活动述评》，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3），载于《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2009年；冯风：《南宋后期太学生参政心态浅析》，《学理论》，2009年第32期，第115-116页。

⑤ 边勃：《两宋太学制度与太学生的参政活动》，《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第76-78页。

历史学者对某几次重要的太学生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运动被讨论得最为深入。<sup>①</sup>程兆奇在《陈东与靖康学潮》中对陈东的舆论表达进行了历史学的考证。作者不仅对前辈研究的一些错误加以更正，<sup>②</sup>还很好地结合了靖康年间的历史背景对陈东为首的太学生的舆论表达加以深入阐释。

此外，历史学者就太学生舆论本身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张晓宇认为北宋太学生救国运动源于太学制度本身，并且与太学在官学中角色的变化、太学师资、太学应试规则有密切关系。<sup>③</sup>张建民认为太学生的社会秩序理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与修史等因素，是太学生舆论表达蓬勃兴起的原因。<sup>④</sup>杨磊分析了南宋学生干政意识的产生来源，并把太学生舆论表达的原因归为外敌入侵与朝廷党争。<sup>⑤</sup>

历史学研究更加注重对史料的挖掘，以还原历史最真实的一面为核心目标。政治学研究则倾向借鉴历史学研究的内容，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总结或提炼出一般意义上的规律。但是，目前尚没有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从公众舆论影响对外政策的角度分析宋代太学生的舆论表达。上述历史学著作作为以政治学视角研究宋代太学生舆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 二、研究方法

对于如何探索太学生舆论与国家战和决策的相关性，我们将对宋代太学生就国家战和政策上书的重要事件进行描述，通过对史实论据的详细整理，追踪太学生对皇帝对外政策的影响过程，从而厘清太学生舆论与皇帝战和决策之间的相关性。

在判定是否对战和决策产生影响之前，有必要明确本文对国家战和决策的定义。在宋代这一特定时期，国家面临的战和决策是对外政策的核心，其中包括与敌国作战或和谈，以及主和派或主战派官员的任免。我们之所以将一些特定官员任免决定纳入研究数据，一是可以拓展可研究的案例数量，二是这些官员任免决

---

① 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史林》，2000年第2期，第23-39页；刘亚中、刘淑萍：《宋代太学生运动领袖陈东活动述略》，《淮北煤师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79-81页。

② 程兆奇：《吴其昌〈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微瑕两例》，《史林》，2003年第6期，第118页。

③ 张晓宇：《北宋太学制度与太学生救国运动内在联系初探》，《学术月刊》，2003年10月。

④ 张建民：《南宋太学生干政活动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⑤ 杨磊：《论南宋学生干政活动》，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定都是与战争或议和的政策选项捆绑在一起的。国家战和决策是国家对外政策中的一种，而非全部。国家的战和决策，指的是在一个国家与敌国关系紧张时，以军事手段还是以谈判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决策选择。在宋代有很多太学生上书的案例，或主张武力抵抗，或主张罢黜主和派宰相而启用主战派官员，这些都属于太学生对外政策舆论的表达。由于国家战和决策在宋代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将集中讨论太学生舆论与战和决策之间的关系。

判断太学生的舆论与战和政策取向的相关性，标准是对外政策制定者（即皇帝）在太学生上书后是否答复并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比如，靖康元年（1126年）太学生陈东等上书请留主战派李纲、重师道，主张抗敌救国，皇帝宋钦宗在舆论压力下被迫重新启用李纲，这就表示太学生舆论与政策取向存在相关性。再比如，同样是靖康元年（1126年），太学生丁特起上书力辨，报告边关告急，并为朝廷提出守御八策。但是由于奸臣主掌朝政，丁特起的上书被搁置不理。此时国家四面楚歌，国亡无日，朝廷在战和问题上摇摆不定，作战时机一误再误。十八日，丁特起再次滴泪上书，乞求速定战和大计，仍然书奏不报。<sup>①</sup>两次均以“书奏不报”告终，皇帝没有对战和决策或官员任免做出调整，这就表示太学生舆论表达后没有出现预期的政策结果，舆论没有影响国家对外政策。

如果宋代太学生对国家战和决策之间的确存在相关性，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太学生舆论对战和决策产生较大的影响便成为本文研究的另一个问题。研究这一问题，我们使用案例分析法。关于案例的选择标准，我们认为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采取“最不相似比较法（least-similar case comparison）”。选取两个或以上的太学生上书案例，但案例之间相似程度低，如处于不同时期、不同的皇帝执政、所讨论的是不同的官员等等，而这几个案例中只有一个因素相同（如太学生上书规模），并且几个案例中太学生上书的结果都相同（如舆论表达成功影响政策）。根据“最不相似法”，我们可以建立起来某个单一因素与因变量的相关性。第二，采取“最相似比较法（most-similar case comparison）”。选取两个极为相似的太学生上书案例，比如在的同一历史时期、同样的上书内容，但存在一个明显不同的因素（如上书规模），最后导致不同的上书结果，一次成功而一次不成功。需要说明的是，在历史上几乎无法找到两个“最相似”的案例，因此我们在案例

---

<sup>①</sup>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八。



分析中，会着重加强对案例的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通过对史料的挖掘，尽量厘清核心变量对于结果的影响机制，并说明其他次要的变量对结果不产生决定性影响。<sup>①</sup>

关于史料的选择，本文案例的出处与引证均来源于一手史料和历史学学术著作。一手史料中，绝大部分引证来源于正史，包括《宋史》、《宋史全文》、《三朝北盟会编》、《续资治通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等。一些记载太学生上书运动的古人文集与传记，我们也同样加以考虑，比如陈东的《少阳集》、李纲的《靖康传信录》。特别说明的是，除了纸质版史料以外，史料软件《中国基本古籍库》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手史料。由于史料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以及便捷的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成为对纸质版史料很好的补充，保证了本研究的史实含量。但是由于学科不同，本研究属于政治学范畴，我们的研究目的并非对非真实历史的还原，只要史学界普遍认可的事件和观点，均可为我们研究所用。

### 三、 宋代太学生舆论影响国家战和决策

中国古代历史上，太学生的舆论表达可追溯到汉代。早在西汉年间，由于鲍宣下狱，博士弟子<sup>②</sup>王咸带领诸生数千人，伏阙上书，请求减罪，并且最终影响了皇帝政策，“遂抵宣罪，减死一等”。<sup>③</sup> 在宋代，太学生的舆论表达更为蓬勃兴盛。人数众多的太学生关心政治，并以伏阙上书等方式参与对内对外政策的讨论，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宋代的太学制度初创于宋仁宗时期。庆历四年（1104年），仁宗下诏正式建立太学。<sup>④</sup>太学是从国子监中独立出来的，太学生与国子监学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国子监人数少且均为贵族子弟，而太学生则多是优秀的庶人子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sup>⑤</sup>随着太学校舍的扩大，可以住在校舍的太学生更加方便向师长请教，经常与其他太学生纵论时事。经过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和宋徽宗崇宁年间的两次兴学，太学生的政治热情更加浓厚，他们拥有“天

---

① Andrew Bennett and Colin Elman, “Case Study Method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bfiel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2, 2007, pp.170-195.

② “博士弟子”指汉代的太学生，由于学生由博士官授课，遂称太学生为“博士弟子”。

③ 《汉书·鲍宣传》，卷七十二。

④ “庆历四年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与京师。”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七》，卷四十六。

⑤ 《宋史·选举制三》，卷一百五十七。

下国家为己任”的责任感，积极参与时事的讨论。兴学之后，太学生人数多达 3800 人，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尤其到了北宋末年，国家面临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太学生讨论政治的热情更为高涨，多次对国家的战和决策表达自己强烈的舆论态度。尤其是太学生的爱国热情，从未终止，他们经常伏阙上书，要求朝廷对敌作战、内除奸贼。

根据政治学学者从主体的角度对公众舆论的划分，我们认为宋代太学生属于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的知晓型公众。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对知晓型公众作了定义：知晓型公众不仅对重要的公共事务表示关注，而且能够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sup>①</sup>由于多数太学生都会入朝做官，因此太学生在太学学习的过程中经常讨论时事，对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不仅感兴趣而且较为了解。另外，太学生的庶人背景使得他们与普通百姓的联系比政治精英更为紧密，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或代表普通民众的舆论态度。由于宋代太学生的这些特点与现代政治学中提出的知晓型公众是较为相近的，所以本研究聚焦于知晓型公众的舆论态度与国家战和取向的相关性。

宋代太学生舆论表达激烈且颇具影响力，与宋代强调制衡、防范弊端的“祖宗之法”和较为开明的言论环境有很大关系。为了避免重蹈唐末和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政治隐患，宋代立国之初就立下了“祖宗之法”，包含守内虚外、以文制武、尊重士大夫等若干政治宗条，以“事为之制、曲为之防”为基本精神。<sup>②</sup>宋代“祖宗之法”中有一条“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为南北两宋的政治生态奠定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基调。特别的是，对上书言事者的保护在宗法上消除了太学生因舆论表达而被杀的风险，进而为太学生舆论表达的兴盛创造了较为开放的政治环境。这样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与印象中专制皇权体制的严苛、权力的高度集中有所不同，反而包含一些民主政治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sup>③</sup>整体来讲，宋代国内政治较为宽松的言论环境为知晓型公众上书言事的蓬勃兴盛创造了一定程度的历史条件。

宋代太学生的对外政策舆论态度与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息息相关。宋代中国

---

① Gabriel A. Almo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raeger, 1950, p.138.

②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③ 邓广铭、漆侠：《宋史：专题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4页。

并非大一统的国家，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与战争持续不断。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看，历任皇帝相继面临与辽、西夏、金和蒙古的战争威胁，“军事作战”还是“谈判议和”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除了国家战和决策，皇帝对于主战派或主和派官员的任免，也属于对外政策的范畴。虽然官员任免是国家内政的一部分，但是对主和派或主战派官员的任免直接与国家的战和决策相关。当主战派官员把持朝政，国家对外政策更倾向于对敌作战；当主和派官员在朝廷官任要位，国家的对外政策就会向息兵避战、谈判求和的方向倾斜。因此，本文讨论的太学生对外政策舆论表达包括：对国家战和决策的讨论以及对主战派、主和派官员任免的提议。

在宋代历史上，我们不仅多次观察到太学生舆论与国家战和取向的互动，而且发现在很多案例中太学生的主战舆论对皇帝决策的可选择空间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即对政策制定者的对外政策制定或主战派与主和派官员的任免造成了影响。历史学者称太学生为“无官御史台”，就准确地表现出太学生舆论对于皇帝决策的限制和监督作用。<sup>①</sup>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五日，太学生领袖陈东率千余名太学生伏阙上书，主张罢免主和派李邦彦，而启用主战派李纲、重师道，认为应当与金国作战，反对丧权辱国的和议。由于太学生的上书反映了百姓的愿望，随即京城不期而至的民众达数万人。一时间，汹涌的舆论声浪让皇帝宋钦宗最终无奈恢复了李纲、重师道的职位，方得以平息舆论，众人才缓缓散去。皇帝重新启用主战派李纲、重师道代表皇帝在国家的战和政策上做出了调整，以顺应民意。可见，国家对外政策构成了影响。

隆兴二年（1164年），金兵再次入侵南宋，群情愤怒，有上书言事者揭露汤思退急于求和、自坏边备的罪状。在舆论面前，宋孝宗顺从了民意，罢免了汤思退，流放永州。紧接着，太学生张观等72人依旧伏阙上书，指责汤思退及其同党王之望、尹穡求和误国，请求罢免之。宋孝宗虽对太学生的舆论表达颇为不满，但面对汹涌的舆论反对声音，最后还是罢免了王之望和尹穡，以平民愤。然而，太学生的主战舆论仍未停止，再次众人伏阙上书，主张皇帝恢复曾被汤思退排挤的主战派陈俊卿的官职。宋孝宗不仅没有给上书言事的太学生定罪，而且听从了

---

① 《鹤林玉露》，卷二。该卷的《无官御史》部分，称“太学，古语云：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

太学生的请求，再次召陈俊卿入朝。由此可见，宋孝宗统治初期的这几次太学生舆论表达都对皇帝的对外政策构成了影响。

嘉定十二年（1219年），已经国力衰颓的金国在南侵中节节败退。面对难得的乘胜追击、收复旧土的时机，独掌朝廷大权的史弥远派工部尚书胡榘与金人讲和。以何处恬为首的273名太学生、12名宗学生和72名武学生相继伏阙上书，指责胡榘求和卖国的行为。最终，宋宁宗顺从了民意，罢免了胡榘工部尚书的职务，贬官到福州。

欲通过以上几个案例中得出结论，说明宋代太学生的主战舆论态度对战和决策构成影响，必须明确一个假定，即太学生的舆论态度并不符合皇帝的心意。因为，太学生舆论内容越符合皇帝心意，皇帝的对外政策越容易和舆论方向相同，这样公众舆论对对外政策制定者的限制力和影响力就相对削弱，难以判断舆论是否对皇帝政策构成影响。比如，宋钦宗年间太学生陈东上书“除六贼”一事，最后的结果是皇帝宋钦宗把“六贼”一一铲除，看似是陈东上书的功劳，但从客观来讲，宋钦宗对“六贼”并无多大好感。加上王黼曾经试图篡夺钦宗的皇位，宋钦宗对“六贼”甚至是深恶痛绝的，铲除“六贼”是符合皇帝宋钦宗的自身利益。虽然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上书对宋钦宗铲除“六贼”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但是这一符合皇帝心意的上书并无法有力说明太学生舆论对皇帝决策的限制和影响，更有可能是舆论与皇帝的偏好产生了巧合的一致，为皇帝的行动提供了合理的说明和机遇。

在以上几个案例中，太学生拥有坚定的主战救国的舆论态度，而皇帝在当时的政策选择却是倾向避战求和，因此太学生的舆论表达都不符合皇帝心意。尤其在隆兴二年张观等72人上书求宋孝宗罢免主和派汤思退的事例中，有史料表明太学生的上书行为导致宋孝宗勃然大怒，欲严厉镇压，但在大臣的竭力劝解后，才得以息怒。<sup>①</sup>这表明太学生的上书的确与皇帝心意相违。不过最终结果是皇帝屈从民意，罢免了主和派官员，启用了主战派人士，这有力地说明了太学生舆论对皇帝战和决策构成影响。

几个案例中太学生上书请愿的成功可以证明：在宋代，知晓型公众舆论与皇帝的战和政策取向之间存在相关性，而且一定程度上对皇帝对外政策的制定构成

---

<sup>①</sup> 《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上。

了影响和限制，皇帝不止一次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顺应民意。诚然，并非所有太学生的舆论表达都获得了成功，还有很多太学生的上书没有得到皇帝的理睬，甚至在少数极端的情况下，上书的太学生还会面临杀身之祸。什么情况下太学生的舆论表达能够影响皇帝决策，什么时候却不被理睬？为什么区区太学生的舆论态度能够影响权力集于一身的皇帝的决策呢？这就需要对太学生舆论的影响程度加以进一步的考察和探讨。

#### 四、太学生舆论规模与政策结果的关系

太学生舆论的表达形式可分为大规模的舆论表达（包括众人联名上书、伏阙上书和罢课）以及小规模私下的舆论表达（包含个人上书、个人伏阙上书和诗文讽政）。在历史上可能还有很多规模较小的太学生舆论表达，但是由于重要程度低而未被史书记载。学者黄现璠在其著作《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中整理了宋代太学生舆论表达的全部重要案例，杨磊在《论南宋学生干政活动》对南宋的太学生舆论表达的重要案例进行了整理，二文几乎囊括了所有较显著的宋代太学生舆论表达的案例。我们结合二文把所有太学生舆论表达的案例进行了归类，在共 39 个案例中<sup>①</sup>，根据对内与对外政策舆论的区分，共有 14 个太学生对外政策舆论表达的案例。在 14 个案例当中，有 4 个案例和战和舆论无关，都发生在两宋之交的靖康年间，与营救二帝有关，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表 1 列出了全部 10 个宋代太学生就战和问题表达舆论态度的案例。在这些历史案例中，我们发现太学生上书的规模与上书结果存在联系，规模大的太学生舆论表达容易取得成功，即影响皇帝对外政策决策。因此，我们提出关于太学生舆论影响对外政策的规模效应假设：

太学生舆论表达的规模越大，越容易影响国家战和政策。小规模的太学生舆论表达，容易不被皇帝理睬；大规模的太学生舆论表达，容易迫使皇帝屈从民意，做出政策改变。

纵然，左右太学生舆论影响程度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认为太学生舆论的规模效应是众多因素中最为核心的。规模效应假设的逻辑在于，当太学生舆论表达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比如数百名太学生伏阙请愿或数万民众集会，皇

---

<sup>①</sup> 详见附录 1。

帝无法躲避或推诿，不得不立即面对，并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尤其是靖康元年陈东伏阙上书乞留李纲一事更为明显。皇帝曾有过动用警备队和禁卫军镇压太学生的想法，但是军民集会所带来的民意之汹涌、声势之浩大，使得朝廷敛手。<sup>①</sup>可以说，皇帝在大规模的民意呼声面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通过启用主战派官员等方式来平息民意。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三个正例和两个反例，对太学生舆论的规模效应假设进行检验。在案例描述中，厘清舆论表达的规模对皇帝决策构成的影响，排除其他次要因素对皇帝决策的影响。

表 1 太学生的战和舆论表达与皇帝决策关系一览表

时间	人物	事由	规模	皇帝	政策结果
靖康元年 (1126)	陈东、高登、雷观、张柄等数千名太学生	请留主战派李纲、种师道，主张抗敌救国	大	钦宗	成功：李纲被皇帝所启用
靖康元年 (1126)	丁特起	女真人入侵，滴泪上书，献守御之策	小	钦宗	失败：书奏不报
靖康二年 (1127)	陈东、欧阳澈	请求留任主战的李纲而罢黜求和的黄潜善、汪伯彦	小	高宗	失败：陈东、欧阳澈被杀
绍兴三十一年 (1161)	宋苞、程宏图	女真完颜亮南侵，太学生主张武力抵抗	小	高宗	失败：书奏不报
隆兴二年 (1164)	张观等 70 多名太学生	汤思退结党营私、主和误国，太学生请斩之	大	孝宗	成功：驱逐汤思退
隆兴二年—乾道元年 (1164-65)	太学诸生	陈俊卿早年遭汤思退排挤出朝廷，学生请愿召还之	大	孝宗	成功：陈俊卿归朝
嘉定六年 (1213)	黄自然、黄洪、周大同、徐士龙	乔行简主张继续向金人支付岁币，学生请斩之，主战救国	小	宁宗	失败：朝廷不从其言
嘉定十三年 (1219)	何处恬等 273 名太学生；公记等 12 名宗学生；郑用中等 72 名武学生	工部尚书胡榘结党营私，求和误国。学生请求将其罢黜之	大	宁宗	成功：朝廷罢黜胡榘
咸淳二年 (1266)	临安府学生叶李、萧规	贾似道与蒙古媾和，复又反悔，至蒙军连连南侵。府学生上书诋之	小	度宗	失败：贾似道教唆学生诬告二人，将叶、萧刺字发

<sup>①</sup> 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史林》，2000年第2期，第34页。

咸淳四年 (1268)	郭子昌	蒙古围襄阳，贾似道隐瞒军情。诸生请求调兵解围，并上书献守御之策	小	度宗	失败：未被采纳
----------------	-----	---------------------------------	---	----	---------

资料来源：黄现璠：《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商务印书馆；杨磊：《论南宋学生干政活动》，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 （一）案例 1：靖康元年陈东等伏阙乞留主战派李纲、重师道之成功

宣和七年（1125年），金国将领斡离不、粘罕分兵两路南侵，连连攻陷北宋城池。靖康元年（1126年）春，金军直逼宋朝首都汴京城下。当时朝廷宰执李邦彦极力主和，向金国供奉金币，而金国仍然苛求无度。此时种师道率领勤王师赶到，种师道部将姚平仲为都统制，并且李纲以尚书右丞兼四壁守御使，种、姚、李三人都主张对敌作战。皇帝同意，命姚平仲为先锋，李纲为后援。<sup>①</sup>然而，在一次信心满满的出兵中，李纲、重师道的准备却并不充足，以失败而告终。皇帝得知后极为震惊和愤怒，于是解除了李纲的兵权，并且还罢免了他的官职。随即，宣抚使种师道也被罢免，右丞相蔡懋取代之。整个国家对金的政策转向议和，命令守城将士不再抵抗。

由于偶然的一个小失利，就罢免大将，撤销城防，面对这样怯懦的对外政策，以陈东、张栻、雷观、高登为首的太学生们伏阙上书，乞留李纲、种师道，要求罢免主和派李邦彦。他们在上书中指出，由于“统制将校，不肯入敌”而遭致失败，并非李纲策划无方，也非李纲御敌不力。陈东在上书中还声称启用李纲、罢免李邦彦是军民百姓的共同呼声。“若以臣等之言未足取信，愿试登御楼，呼召耆老百姓一问之，呼军民一问之，呼行道商旅一问之，试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纲可用而邦彦等可斥也！”<sup>②</sup>

陈东的上书的确反映了军民百姓的愿望，所以在众多太学生伏阙上书时，不期而至的百姓达十万余人。<sup>③</sup>起初，枢密使耿南仲到达太学生伏阙上书现场，对众人表达了已向皇帝传达了学生的请愿。但是众人疑虑耿南仲说假话，围住他的马，耿南仲只好步行上朝。之后，开封尹王时雍到来，威胁众太学生道：“胁天子可乎，胡不退？”太学生遂给出强硬回应：“以忠义胁天子，不愈于以奸佞胁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五。

② 《少阳集·伏阙上钦宗皇帝书》，卷二。

③ 《靖康传信录》，卷二。

之乎？”<sup>①</sup>在太学生欲上前殴打时，王时雍已经迅疾地离开了。太学生作为读书人，还是比较温良恭顺的，一直以和平的请愿方式表达自己的舆论态度，而前来声援的百姓则情绪激动。不期而至的数十万民众，呼声震天，并把东华门外的登闻鼓击碎。<sup>②</sup>集会的民众封死了道路，几乎没有进出的空隙，摆出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姿态。后来，退朝的百官从东华门出来，行至阙前，众人看见李邦彦，群情被点燃，数论其罪，对其谩骂，前排的民众甚至揪住李邦彦头发，并进行殴打。李邦彦迅速逃跑才得以脱身。<sup>③</sup>

由于主和派把持朝政，对金人屈膝求和，起初无视太学生的主战舆论，甚至准备“纵兵欲尽歼之”。<sup>④</sup>警戒队和禁卫军有过动用武力镇压的想法，但由于后来街上的百姓太多，军队无从措手。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舆论表达，皇帝又无法以武力镇压，只好派耿南仲对民众表示，已经得到圣旨宣李纲回朝了。数千名百姓出门等待迎接李纲，但由于迟迟没有看到召回李纲的证据，百姓的愤怒愈加强烈，最终酿成暴乱。“内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谕，继未到。而后发之使先至，众取拱之裔而磔之，即矫制曰：‘杀内臣者无罪。’又取十余辈杀之，皆裂其体，碎其骨，取其肝肠。揭之竿头，号于众曰：‘此逆贼也。’”<sup>⑤</sup>

直到李纲回到行营司，重师道也回到其家宅，军民百姓才得知二人得以复用，才散去。

由此可见，千余名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皇帝启用主战派李纲、种师道，罢免“卖国求贼”的主和派李邦彦，后来引发十万民众集会的群体性事件。虽然不期而集者数十万人，略有夸张，但是多方史料对太学生与百姓的请愿均比较一致，可以肯定当时所引发的百姓群体性事件的规模是非常大的，以致最终迫使皇帝屈从民意，在官员任免的决策做出调整，罢免主和派并重新启用主战派官员。

## （二）案例 2：南宋初年陈东、欧阳澈请罢汪、黄之失败

靖康之变发生之后，北宋徽钦二帝北狩的消息传到民间，太学生无不痛哭流涕。当时在家乡的陈东听闻国家灭亡且二帝为金军北掳的消息，“嚎天叫地，恨无死所”。靖康二年（1127 年）五月一日，徽宗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归

---

① 《靖康要录》，卷二。

② 登闻鼓，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在朝堂外的悬鼓，百姓可以击鼓上闻，以审冤抑，或陈谏议。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四。

④ 《宋史·高登传》，卷三百九十九。

⑤ 《靖康要录》，卷二。



德)宣布即位皇帝。宋高宗登基后第五天任命主战派李纲为宰相,五日过后召陈东进南京。陈东接到皇帝的复召,心怀对新政权的期望,表示新天子即皇位仅十日,就下召布衣百姓,一定是愿意倾听天下之言,有这样的君主,实为难能可贵。<sup>①</sup>这样,陈东毅然离家赴召,经过三个月的跋涉,于八月五日赶到行在。陈东到达南京,而此时高宗的宠臣汪伯彦、黄潜善却打击李纲<sup>②</sup>,以致高宗罢免了李纲的宰相职位。

八月十日,陈东上书尚书省,乞留李纲,书曰:“陛下若必许纲去者,是不以天下之心为心也;若纲必去,是不忠于陛下而负天下之望也;黄潜善、汪伯彦之徒若必欲排挤李纲以为自进之计,是不以君父宗社为念而不畏天下公议者也。”

<sup>③</sup>

陈东请留李纲而求罢汪、黄二人的理由是天下之心,换句话说,陈东在上书中打着天下百姓的旗号,声称代表着百姓民意。但是这次上书的结果却不了了之,以尚书省不报而终。

七日后,陈东再次上书宋高宗,为李纲辩护,乞求罢免当时的宰相汪伯彦、黄潜善,希望宋高宗任用贤才,并且请求皇帝御驾亲征,迎回二帝。十八日,宋高宗下诏罢免李纲,宣告陈东此次上书的失败。十九日他再次上书,因为李纲的被罢免已成事实,陈东对于李纲之事只表示“纲既去,臣复何言”,但这最后一次上书确是陈东最长的一次上书。<sup>④</sup>书中着重论述了“天下最大之事”是“二圣早还”,并且“当今最急之务”是“用兵亲征”以“挫折虏气”。最终陈东的上书没有得到宋高宗的任何回应,以失败而告终。不仅如此,陈东还把自己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此时,恰逢一个叫欧阳澈的布衣百姓上书,极力指责汪伯彦、黄潜善。根据《宋史》忠义列传中描述,欧阳澈此人天性善谈世事,不屈从权威,忧国闵时。但他却年少轻狂,在金人攻来之际狂言“我能口伐金人,强于百万之师”。南宋初期欧阳澈指责宰相的上书,引起了黄潜善、汪伯彦的不满,汪黄二人斥责欧阳

---

① 《少阳集》,卷三。

② 汪伯彦之所以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幸,起源于这样一个故事。当年时为康王的赵构赴金营当人质,后因金人不相信他康王的身份而将其放回。行至磁州,赵构感觉无处所趋,顿感流浪之困。在这为难的时候,正是相州刺史汪伯彦带着兵马迎请赵构到相州安顿。赵构对此极为感激,甚至对汪伯彦言听计从。汪伯彦在南宋立国之后成为影响宋高宗的第一个人。

③ 《少阳集》,卷三。

④ 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第38页。

澈所言不符事实。而且，黄潜善还用言语激怒皇帝，指出如果不诛杀欧阳澈，恐怕会再次出现民众击登闻鼓、伏阙上书的骚乱。<sup>①</sup>结果朝廷不光治欧阳澈死罪，还牵连了陈东，二人同斩于市。有历史学者认为，陈东之死表面是受到欧阳澈的牵连，其实不然。汪伯彦、黄潜善杀害陈东的想法久已有之，只是没有合适的时机，欧阳澈上书一事正好给了他们除掉陈东的借口。<sup>②</sup>

陈东的这三次上书和欧阳澈的上书都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并没有引起其他太学生一起伏阙上书或普通百姓的集会行动。由于规模较小，给皇帝带来的舆论压力是微弱的。正是由于舆论规模小，打压个人上书的成本较低，所以官员不上报，皇帝也不理睬。同时，陈东的上书所说的“天下最大之事”与“当今最急之务”都并不符合高宗的心意，对高宗实有冒犯。虽然冒犯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陈东的主张确实是宋高宗深深忌讳的。陈东满腔热忱的上书可谓是句句逆皇帝之耳，是不符合皇帝心意的。乃至最后面临杀身之祸。

### （三）案例 3：绍兴三十一年宋苞、程宏图上书主张武力抗金之失败

绍兴九年（1139 年）和绍兴十一年（1141 年），由于宋金双方战场上的实力平衡，在宋高宗的一意求和与秦桧的主持下，南宋与金国先后签订了两次绍兴和议，按金国的年号分别成为天眷和议与皇统和议。此后宋金维持了近 20 年的和平。在宋高宗的支持与授意之下，主和派秦桧独相 19 年，其间主和派势力基本占据了朝廷中枢。甚至，秦桧对朝野舆论包括太学生舆论严加控制，将打击和议反对派的行动扩大成为压制不同思想、政见的一般性政策。

绍兴二十八年（1158 年），秦桧死，朝廷对舆论的控制有所减弱。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雄心勃勃的金国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不顾金国朝廷内部的反战情绪和金国后方起义暴动而造成的后方不稳之风险，决意发动对南宋的大规模灭国战争，六十万大军分兵四路进行南侵，意图一举消灭南宋。此时的南宋不仅毫无战争准备，而且曾经令金人闻风丧胆的岳飞已经被杀害，能征善战的大将军韩世忠也闭门谢客、不问军政。面对金人完颜亮来势汹汹的侵略，南宋再一次陷入危急存亡的关头。正是在此时，太学生又一次不畏高压、挺身而出，程宏图、宋苞等太学生以个人名义先后上书，向皇帝献守战之策。“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歿，悉正典刑。于是断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

① 《宋史·欧阳澈传》，卷四百五十五，列传第二百一十四，忠义十。

② 刘亚中、牛淑萍：《宋代太学生运动领袖陈东活动述略》，第 81 页。

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sup>①</sup>

由此可见，程宏图、宋苞等太学生上书请求皇帝首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并且希望为岳飞昭雪，以舒天下不平之心，振其敢为之气。<sup>②</sup>秦桧是主和派的代表，岳飞是主战派的典型，太学生的上书表面期望皇帝首正秦桧而为岳飞平反，实则希望通过这样的“惩恶扬善”来扭转朝廷避战主和的对外政策，希望宋高宗主战抗金，激励士气。但是，此次上书并未形成较大规模，对政策制定者的限制力度有限。最终，上书以失败告终，宋高宗既没有下罪秦桧，也没有昭雪岳飞，相当于没有直接回应太学生的上书。

#### （四）案例 4：隆兴二年张观等 72 人上书乞罢汤思退之成功

程宏图、宋苞的主战上书没有得到成功，但完颜亮率领的金国铁蹄却成功南下，矛头直指南宋的都城建康。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十月，金人完颜雍在辽阳府称帝，是为金世宗，对完颜亮的合法性构成巨大挑战。十一月八日，面对后方掣肘的完颜亮在采石大战中惨败在南宋文臣虞允文手中。南宋在采石大战取得了胜利，成为本次宋金战争的转折点。同月二十八日，瓜州金军兵变，海陵王完颜亮被杀，金军北还。此时，南宋在战场上取得了一定优势的情形下，再次面临战和的选择：是继续乘胜追击，收复被金人占领了数十年的祖宗之地，还是维持现有平衡，保持现有疆土，继续偏安江南。正在朝野主战舆论大起的时候，一生逃难避战在江南延续赵宋江山的高宗赵构已无心做出自己的选择，“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臧”<sup>③</sup>，他决定禅让退位，由其养子赵昚接替自己的皇位。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宋高宗内禅，自称太上皇帝，赵昚登上历史舞台，是为宋孝宗。

孝宗是南宋有名的励精图治、爱国主战的皇帝。他作为太子时，就主张抗金作战。孝宗即位后不久就启用主战派张浚、胡铨等人，并且下诏追复岳飞，一展其抗金决心。转年五月（隆兴元年，1163 年）孝宗北伐，然而战机早已因为南宋朝廷内部的皇帝禅位与战和争议不定而错失。符离战役的大败宣告了孝宗北伐的结束。此后，南宋朝廷主和避战的舆论大起，宋孝宗也不敢再坚持作战，开始启用秦桧的党羽、主和派人士汤思退主政，决意求和。并且，身居内宫的太上皇宋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三十六。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三十七。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百。

高宗也支持议和，极尽孝心的宋孝宗很少违背宋高宗的意见，所以孝宗在对外政策的“战和”摇摆中更倾向于议和。

汤思退继任宰相后，首先把主战派张浚排挤至死，然后一面继续在朝中排挤主战派官员，推荐自己党羽，以王之望为参知政事，贺允中为知枢密院事，一面秘密派遣人到金营，希望金国配合，出兵胁迫南宋进行和议。<sup>①</sup>由此可见，汤思退不光避战求和而且出卖国家利益。

隆兴二年（1164年）十一月，金军再次兵临长江，求和败退的政策又一次把南宋推向危急存亡。据《宋史·汤思退传》记载：“上闻有敌兵，命建康都统王彦等御之，仍命思退督江淮军，辞不行。（金人）仆散忠义，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极论思退急和撤备之罪，遂罢相，寻责居永州。于是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论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奸邪误国，招致敌人，请斩之。思退忧悸死。”<sup>②</sup>

由此可见，在太学生张观上书之前，就有其他民众（“言者”）群情激奋地表达了罢黜汤思退的舆论声音，皇帝顺从了民意，罢免了汤思退的宰相之位，流放永州居住，诏令陈康伯为左宰相兼枢密使，虞允文为同签书枢密院事。紧接着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联名上书，要求惩处汤思退及其同党，以谢天下。根据《宋史全文》记载，张观在上书中极言汤思退、王之望、尹穡三人误国之罪过：“汤思退首倡和议，之望、尹穡附之极力挤排，遂致张观罢去，边备废弛，堕敌人计中，天下为之寒心。而思退辈方以为得计。今敌人长驱直至淮甸，皆思退等三人怀奸误国，岂可置之不问哉。此三人之罪，皆可斩也。”<sup>③</sup>

这次太学生上书并不符合皇帝心意。史书记载，太学生酝酿伏阙上书时，参知政事周葵奏请宋孝宗以黄榜方式禁止上书，对太学生舆论加以控制。黄榜曰：“靖康军兴，有不逞之徒，鼓倡诸生伏阙上书，几至生变。若蹈前辙，为首者重置典宪，余人编配。”<sup>④</sup>但是太学生不顾禁令，依旧人数众多联名上书，试图影响政府决策。史料记载，太学生的上书行为导致宋孝宗勃然大怒，欲严厉镇压，但在大臣的竭力劝解后，方以息怒。<sup>⑤</sup>

最终，宋孝宗面对号称八十万的金军和因汤思退的破坏而懈怠的宋军并顾忌

① 顾宏义：《天裂》，第368-369页。

② 《宋史·汤思退传》，卷三百七十一。

③ 《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上。

④ 《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上。

⑤ 《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上。

太上皇高宗的主和立场，同时宋孝宗为了缓和民众的愤怒，不得不做出政策的妥协：虽然无法任用一贯主张抗金作战的胡铨，但最终还是罢免了妥协避战的王之望和尹穉。由此可见，张观等太学生的此次上书对皇帝的决策造成了影响，与西方政治学学者总结的如出一辙——太学生为代表的公众舆论限制了皇帝对外政策的范围。

太学生上书逐汤思退及其党羽一事刚刚结束，太学主诸生又伏阙上书，希望皇帝启用主战派陈俊卿。陈俊卿曾经担任过礼部侍郎参赞军事，协助主战派张浚进行对金人的作战准备。但在符离之溃以后，受到了汤思退等主和派的打击，被排挤出朝廷。面对太学生召陈俊卿回朝的伏阙上书，宋孝宗反而看到了太学生的忠义，并没有因为其一再上书干政、表达舆论而欲治其罪。并且，孝宗答应了太学生的请求，复召陈俊卿入朝。太学生上书表达舆论的行为再一次成功影响皇帝在对外政策上的人事任免。

#### （五）案例 5：嘉定十三年三学生数百人求罢胡榘之成功

隆兴议和之后，宋金两国维持了三十余年的和平。金国经过了金世宗政治上稳定政局，经济上发展生产，外交上协调西与西夏、东与高丽的关系，到金章宗时期，达到金国统治的鼎盛时期。但是随着女真社会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并且，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新兴的蒙古国在北方崛起，不断侵扰金国，使得金国的处境恶化。十三世纪初期，金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境地，元气大伤，国事日衰。南宋开禧年间，宋宁宗主政，支持抗金，在宰相韩侂胄的主持下主动发起了对金国的“开禧北伐”。但是，由于南宋在军事上准备并不充分，而金军的准备则较为完备，以致南宋的进攻皆以失败告终。在金国的追击下，南宋反倒面临窘迫局势，不得不与金国议和，于嘉定元年（1208 年）签订嘉定和议。

金宣宗成为金国皇帝之后，由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于嘉定十年到嘉定十五年（1217 年到 1222 年），对南宋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希望弥补由蒙古人入侵所带来的损失。但由于日益衰退的国力，金国军队已是强弩之末，横遭败绩，被南宋军队打到了淮河以北。此时，得到宋宁宗授权的史弥远掌管朝政，但是他并没有收复失地的决心，反而采取了消极抵抗的对外政策，派其党羽工部尚书胡榘与女真人议和。

嘉定十二年（1219年），由于错过千载难逢的收复故土的机会，反而与敌国议和，何处恬等 273 名太学生上书，指责工部尚书胡榘误国求和，“请诛之，以谢天下”。<sup>①</sup>由于一开始奏闻未报，导致以公记为首的宗学生 12 人，郑用中为首的武学生 72 人，相继伏阙上书，极言声讨胡榘的求和行为。<sup>②</sup>这是南宋时期三学学生的首次联合舆论表达，规模庞大，声势浩大。如此强烈的太学生舆论立即得到了朝廷中很多官员的积极响应。秘书监柴中行上奏表示，不应当含糊不理三学学生的舆论，这是庇护个人而使皇帝有拒绝谏言的过失。<sup>③</sup>随后，国子监萧舜治上奏反映太学生之诉求，有的谏议大夫也请愿要求罢免胡榘。在跌宕起伏的舆论声中，最终胡榘被罢免了工部尚书的职务，被迫离开朝廷，贬至福州。

在这一案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太学生、宗学生、武学生的舆论表达是规模浩大的，一共三百五十多人伏阙上书言事。较大的规模引来朝廷精英舆论的关注，从而巨大的舆论压力最终影响了皇帝决策，罢免了主和派官员。《宋史全文》对该事件的评价很好的总结了太学生舆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方残金渝盟，引兵入侵，榘顾欲与金讲和，以偷旦夕之安，是上则忘国耻，下则忘家学也。学校公议之地，安能逃其讥议乎。”<sup>④</sup>

## （六）案例讨论

以上 5 个案例中，案例 1、案例 4 和案例 5 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太学生舆论表达，并且都成功影响了皇帝的对外政策。比较这三个案例，发生于不同的时间（1126 年、1164 年和 1219 年）且相隔较远，执政的皇帝也不同（分别是钦宗、孝宗和宁宗），请求罢免的官员也不同，属于最不相似的案例（least-similar cases）。在众多不同的条件下，明显的共同点就是都发生了大规模的舆论表达。靖康年间陈东率数千太学生伏阙上书，隆兴年间张观率 70 多名太学生伏阙上书，嘉定年间共计 300 余名太学生、宗学生和武学生伏阙上书，都给政策制定者施加了较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其做出政策调整。比较中可以发现，规模大的太学生舆论表达在不同案例中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由于伏阙上书规模较大，给政策制定者构成了瞬时的压力，迫使皇帝不得不立即做出回应，所以在每个案例中，不同的皇帝同样地罢免了主和派官员，启用主战派，以平息舆论压力。并且，三个案例中皇

---

① 《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十五。

② 俞文豹：《吹剑录·外集》。

③ 同上。

④ 《宋史全文》，卷三十。

帝本来是倾向议和的，太学生的主战舆论并不符合皇帝心意，因此可以说明大规模的太学生舆论与皇帝战和选择的相关性强，一定程度影响和限制了皇帝决策。

案例 1 与案例 2 属于两个十分相似的案例（most-similar cases）。两次上书请愿时间相隔仅有一年，主要人物都是陈东，基本主张都是请求启用主战派李纲。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案例 1 舆论规模大，数千名太学生以及不期而至的数万名百姓，案例 2 规模小，陈东和欧阳澈仅仅采取了个人书上的形式，没有形成较大的声势。如果陈东和欧阳澈的上书能够召集众多太学生与他们一起伏阙上书，或许在众人的保护下，陈东和欧阳澈至少不会丧命。太学生舆论表达的规模效应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舆论表达的时效性和影响力。相反，陈东和欧阳澈仅通过个人上书，陈述主战舆论态度，书奏往往会受到朝廷官员的耽搁或直接被皇帝所忽略，无法形成舆论压力的瞬时效应，对皇帝战和决策的影响力较弱。两个案例从一正一反两方面验证了太学生舆论表达的规模效应假设。

需要说明的是，两个案例中虽然皇帝不同，但是宋钦宗和宋高宗在对外政策上都倾向避战求和。如果做反事实的假设，高宗赵构面对千余名太学生的伏阙请愿和数万名百姓的主战舆论压力，他也许同样无计可施，不得不顺从民意启用李纲。如果没有发生靖康之变，宋钦宗面对一名太学生陈东的主战上书，他完全有可能不理睬陈东的请愿，因为此时违背民意的成本是很低的。可见，不同皇帝这一变量在舆论规模的变量面前，其影响效力是很小的。

从太学生舆论影响对外政策的 3 个成功案例与 2 个失败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案例 1、案例 4 和案例 5，从正面证明了太学生舆论表达的规模越大，越容易影响皇帝对外政策决策；而案例 2 和案例 3，从反面证明了小规模太学生舆论表达不容易对皇帝对外政策造成影响。通过对案例 1、案例 4 和案例 5 的三个最不相似的案例分析以及案例 1 和案例 2 的两个最相似的案例比较中，我们进一步厘清了太学生舆论的规模效应，大规模的舆论表达容易影响国家战和决策。皇帝制定战和决策的时候受到太学生舆论的影响，原因是太学生上书言事规模之大，被迫做出一定的政策调整，而且主要体现在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官员任免上。小规模太学生舆论表达，纵使其饱含爱国之心并且所言合情合理，但终究对皇帝的战和决策影响力很小。

## 五、结论

我们从史料和史学研究中整理出关于宋代太学生的战和舆论态度表达，并对太学生舆论表达的案例进行了考察与分析。作为宋代政治生态中的知晓型公众，太学生群体大多来自庶族家庭，与普通百姓的关系较为紧密；同时，以入朝为官为理想的太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并积极参与相关政策的讨论。尤其是在面临外敌入侵之时，以军事手段抗敌斗争还是以谈判方式屈膝议和，这一战和决策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与之相关的主战派与主和派官员的任免也事关国家的对外政策倒向。在宋代历史上，太学生多次表达其明确的战和舆论态度，始终坚定地希望国家对敌作战，主张罢免主和派官员并启用主战派官员。同时，宋代太学生以多种形式向政策制定者表达了他们的主战舆论态度。有些舆论表达规模巨大，数千学生伏阙上书，甚至引发百姓集会；有些规模甚小，表现为个人上书请愿或作诗讽政。总的来说，宋代太学生群体是当时历史环境下的知晓型公众，其对外政策态度是稳定的、一致的，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对外政策舆论态度。

在宋代皇权专制体制下，太学生舆论对皇帝的战和决策及官员任免存在相关性，太学生舆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对外政策决策。靖康年间，陈东率千余名太学生伏阙上书，乞留主战派李纲、重师道，并引发数万军民大集会，共同表达主战避和的对外政策舆论，皇帝宋钦宗面对汹涌的主战舆论，不得不屈从民意，重新启用主战派官员。隆兴年间，张观率 72 名太学生伏阙上书，指责主和派汤思退的卖国屈辱行径，请求罢之，并要求召回主战派官员陈俊卿。皇帝宋孝宗反感太学生舆论，担心“激至生变”，但最终在舆论压力面前，还是罢免了汤思退及其党羽并重新启用了主战派陈俊卿。嘉定年间，太学生、宗学生和武学生共 300 多人伏阙上书，要求惩处主和派胡榘，迫使皇帝宋宁宗不得不把胡榘罢免出朝廷。众多历史案例说明，太学生对外主战抗敌的舆论表达对皇帝战和决策构成一定的影响，体现了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知晓型民众舆论对皇帝对外政策制定权的限制。

通过对 5 个太学生对外舆论表达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太学生舆论表达的规模决定了其对皇帝对外政策的影响程度。太学生舆论表达规模越大，如众人多次伏阙上书，对皇帝决策的影响越大。因为，皇帝在面对汹涌民意的时候，镇压成本上升或无法镇压，又迫于上书舆论表达所带来的巨大压力，皇帝无法拖延而不得不立即解决，因此顺应民意，做出一定的对外政策的调整。在皇权专制制度下，知晓型公众舆论利用瞬时的规模压力迫使政策制定者被动地做出政策调整，从而



影响国家对外政策。

本研究在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关系的大背景下，聚焦于知晓型舆论对战和决策的影响，是从一个小的角度对舆论与政策关系进行见微知著的阐释。知晓型公众是公众舆论主体中的一部分，虽然宋代的太学生即一定程度代表了普通民众舆论态度，也反映一部分精英舆论的战和倾向，但是太学生仍然是宋代社会中的一个群体，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战和舆论倾向。同样的，国家的战和舆论虽然是对外政策的核心，但并非宋代对外政策的全部。比如南宋时期，国家的对外政策还包括对外贸易政策，尤其是海上贸易政策。宋朝廷多次尝试海禁，但都没有获得成功，舆论在中间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作用。因此，中国古代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关系的讨论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太学生舆论与国家战和决策的视角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为一般意义上舆论与政策关系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尝试。

本研究尝试对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制下的舆论与政策关系进行讨论，但仍然难以避免受到研究资料、研究能力等多方面的限制，得出的结论有待进一步的检验，我们也期待出现更多关于舆论与政策关系的研究。首先，中国不同朝代的舆论与政策关系是否也呈现相似的互动模式，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有潜力的方向。其次，公众舆论是否代表国家利益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问题。无论在那种政治体制下，政策制定者都免不了受到舆论对影响，公共政策甚至会被舆论所绑架，因此，在什么情况下，公众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相信在更多学者的努力下，我们能够对舆论与政策的关系加以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审视，从而更好的指导我们理解复杂的现实政治。

附录 1 宋代太学生舆论表达重要事件一览表

时间	公元时间	人物	类型	事由	规模	皇帝	政策结果
大观年间	1107-1110	李彪	内政	请革时弊	小	徽宗	失败：付狱推治
大观三年	1109	陈朝老	内政	请罢相何执中	小	徽宗	
宣和元年	1119	邓肃	内政	讽君逸乐	小	徽宗	失败：被逐出太学，放归田里
宣和年间	1119-1125	朱梦说	内政	昌言宦寺	小	徽宗	失败：窜斥偏州
宣和七年	1125	陈东	内政	请诛六贼	小	徽宗、钦宗	成功：六贼被一一铲除
靖康元年	1126	陈东、高登、雷观、张柄等数千名太学生	对外-战和	请留主战派李纲、种师道，主张抗敌救国	大	钦宗	成功：李纲被皇帝所启用
靖康元年	1126	丁特起	对外-战和	女真人入侵，滴泪上书，献守御之策	小	钦宗	失败：书奏不报
靖康元年	1126	徐揆、汪若海、余觉生等	对外-其他	营救二帝	小	钦宗	失败：被杀或窜斥偏州
靖康元年	1126	董时升	对外-其他	募捐以救驾		钦宗	
靖康元年	1126	吴若	内政	请罢张邦昌		钦宗	
靖康二年	1127	秦仔	内政	诏立高宗		钦宗	
靖康二年	1127	黄时偁	对外-其他	营救二帝	小	钦宗	
靖康二年	1127	吴铎、徐仁	对外-其他	参谋夺二帝归		钦宗	
靖康二年	1127	陈东、欧阳澈	对外-战和	请求留任主战的李纲而罢黜求和的黄潜善、汪伯彦	小	高宗	失败：陈东、欧阳澈被杀
绍兴三十一年	1161	宋苞、程宏图等	对外-战和	女真完颜亮南侵，太学生主张武力抵抗	小	高宗	失败：书奏不报
隆兴二年	1164	张观等 70 多名太学生	对外-战和	汤思退结党营私、主和误国，太	大	孝宗	成功：驱逐汤思退

				学生请斩之			
隆兴二年-乾道元年	1164-1165	太学诸生	对外-战和	陈俊卿早年遭汤思退排挤出朝廷，学生请愿召还之	大	孝宗	成功：陈俊卿归朝
乾道、淳熙年间		乔嘉、朱有成	内政	御史中丞何澹不守母丧，不解官，太学生移书责之	小	孝宗	成功：何某畏惧，始去职守丧
绍熙二年	1191	余古	内政	光宗嬉戏终日，不勤不孝，致使朝政废弛。余古试图对光宗嬉戏终日，不勤不孝，致使朝政废弛。余古试图对其进行规劝	小	光宗	失败：光宗大怒，将余古送秀州听读
绍熙四年	1193	王安仁、龚日章、刘改过等数百人	内政	光宗违背孝道，就不入省养父孝宗。太学生伏阙上书，孝谏光宗	大	光宗	成功：光宗碍于众议，不得不前往探望孝宗
庆元元年	1195	周端朝、张道、徐范、蒋传、林仲麟、杨宏中共六人	内政	韩侂胄将赵汝愚排挤出朝廷，太学生及部分官员试图挽留之		宁宗	周端朝等被流放五百里听读，至韩侂胄死，始还
嘉定初年	1208	吴幼存等	内政	纸币贬值，朝廷虽下禁令，但大多不行，故太学生提出政策建议		宁宗	成功：朝廷听取建议，返还籍没的富户财产。纸币价值稍有恢复
嘉定三年	1210	太学诸生与武学生周源等人	维权	京兆尹赵师颺逮捕学生，引发诸学不满，遂展开“驱赵运动”	大	宁宗	成功：赵师颺遭到罢免，手下诸人皆有惩处
嘉定年间		三学诸生	维权	京兆尹余晦违逆诸生之意，开罪士人，故遭攻击。祭酒蔡杭因此事同遭罢免，学生通过罢课、伏阙上书挽留之	大	宁宗	成功：余晦辞京尹之职，出知地方。蔡杭不久被召还，最终官至枢密院
嘉定年间		太学、武学诸生	维权	京兆尹程覃因禁用青盖及鞭挞学生仆人之事激怒众生，故遭攻击	大	宁宗	成功：程覃被免原官，转为司农卿。
嘉定六年	1213	黄自然、黄洪、周大	对外-战和	乔行简主张继续向金人支付岁	小	宁宗	失败：朝廷不从其言

		同、徐士龙		币，学生请斩之，主战救国			
嘉定十三年	1219	何处恬等 273 名太学生；公记等 12 名宗学生；郑用中等 72 名武学生	对外-战和	工部尚书胡榘结党营私，求和误国。学生请求将其罢黜之	大	宁宗	成功：朝廷罢黜胡榘
宝庆元年	1225	潘壬、潘丙	内政-参与党争	史弥远拥立理宗，引发民间义愤。潘壬、潘丙兄弟率太湖渔民、巡卒，试图帮助济王夺取皇位	大	理宗	失败：起义失败，潘氏兄弟及济王相继被杀
端平年间	1234-1236	三学诸生、武学生刘实甫等二百余人	内政-参与党争	济王为史弥远毒害死，恰逢皇宫大火，学生便借此上书，为其鸣冤	大	理宗	成功：朝廷不得已逐步为济王平反，复其爵位。殿院蒋峴因反对学生而遭罢免
端平年间	1234-1236	太学诸生	内政-参与党争	殿中侍御史杜范弹劾金书枢密院事李鸣复勾结贪官史寅午、彭大雅，无所不为。太学生与杜范相呼应，攻李鸣复	大	理宗	李鸣复被迫辞官，杜范被调任起居郎，亦辞官
淳祐四年	1244	太学诸生	内政-参与党争	同知枢密院事杜范与李鸣复相恶，将辞官去。太学诸生上表挽留之，与杜范同攻李某	大	理宗	成功：毒贩最终被任命为宰相
淳祐四年	1244	太学生黄伯恺、金九万、孙翼凤等一百四十四人；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学生舆寰等	内政-参与党争	理宗下诏征史嵩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封永国公。官员、诸生以其丁忧在身，不应出仕，群起攻之	大	理宗	成功：朝廷罢黜史嵩之

		三十四人					
淳祐四年	1244	蔡德润等一百七十余人	内政-参与党争	官员徐元杰、刘汉弼二人疑似暴卒。太学生为其鸣冤	大	理宗	不了了之
宝祐年间		池元坚等人	内政-参与党争	察御使洪天锡弹劾宦官董宋臣等，将去职，故众学生竭力挽留之。太学生林自养投靠权奸，上书诋毁洪天锡及宰相谢方叔。众学生又攻林自养	大	理宗	谢方叔改授观文殿大学士，洪天锡任为广南东路转运使，不就，更升显职
宝祐四年	1256	三学诸生	内政-参与党争	理宗复欲起用史嵩之，并厚加赏赐。此举引发学生不满	大	理宗	成功：史嵩之被迫依前官致仕
宝祐四年	1256	陈宗、刘黼、黄镛、曾唯、陈宜中、林则祖等六人	内政-参与党争	丁大全专擅朝政，引发民变，至敌寇侵入国境。诸生请求将其罢黜	小	理宗	失败：留任遭到严厉打击、贬逐外州
景定五年	1264	太学生吴绮、许求等人；宗学生胡标、谢禹等人；武学生杜士贤等人	内政	贾似道推行公田政策，触犯富民利益。故太学生上书借彗星事讽刺之	小	理宗	失败：遭到贾似道沉重打击，众多仕人被捕、议罪
咸淳二年	1266	临安府学生叶李、萧规	对外-战和	贾似道与蒙古媾和，复又反悔，至蒙军连连南侵。府学生上书诋之	小	度宗	失败：贾似道教唆学生诬告二人，将叶、萧刺字发配漳州

资料来源：黄现璠：《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商务印书馆；杨磊：《论南宋学生干政活动》，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